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 王先霈 著

中国古代诗学 十五讲

“诗乃是对存在和万物之本质的创建性命名”，

诗的高境界、文学艺术的高境界和哲学的高境界是彼此重叠、
彼此融合的，人生的高境界是诗与哲学的结合。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诗学十五讲/王先霭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8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ISBN 978-7-301-12226-6

I. 中… II. 王… III. 古典文学—文学理论—文学评论—中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9536 号

书 名: 中国古代诗学十五讲

著作责任者: 王先霭 著

责任编辑: 艾 英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2226-6/I·091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河北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9.75 印张 320 千字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总序

本书系编审委员会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是由北京大学发起,全国十多所重点大学和一些科研单位协作编写的一套大型多学科普及读物。全套书系计划出版100种,涵盖文、史、哲、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主要学科领域,第一、二批近50种将在2004年内出齐。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出任这套书系的编审委员会主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任执行主编,来自全国一大批各学科领域的权威专家主持各书的撰写。到目前为止,这是同类普及性读物和教材中学科覆盖面最广、规模最大、编撰阵容最强的丛书之一。

本书系的定位是“通识”,是高品质的学科普及读物,能够满足社会上各类读者获取知识与提高素养的要求,同时也是配合高校推进素质教育而设计的讲座类书系,可以作为大学本科生通识课(通选课)的教材和课外读物。

素质教育正在成为当今大学教育和社会公民教育的趋势。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拓展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造就更多有创新潜能的复合型人才,目前全国许多大学都在调整课程,推行学分制改革,改变本科教学以往比较单纯的专业培养模式。多数大学的本科教学计划中,都已经规定和设计了通识课(通选课)的内容和学分比例,要求学生在完成本专业课程之外,选修一定比例的外专业课程,包括供全校选修的通识课(通选课)。但是,从调查的情况看,许多学校虽然在努力建设通识课,也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缺少统一的规划,到底应当有哪些基本的通识课,可能通盘考虑不够;课程不正规,往往因人设课;课量不足,学生缺少选择的空间;更普遍的问题是,很少有真正适合通识课教学的教材,有时只好用专业课教材替代,影响了教学效果。一般来说,综合性大学这方面情况稍好,其他普通的

大学,特别是理、工、医、农类学校因为相对缺少这方面的教学资源,加上很少有可供选择的教材,开设通识课的困难就更大。

这些年来,各地也陆续出版过一些面向素质教育的丛书或教材,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到底应当如何建设好通识课,使之能真正纳入正常的教学系统,并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这是许多学校师生普遍关心的问题。从2000年开始,由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发起,联合了本校和一些兄弟院校的老师,经过广泛的调查,并征求许多院校通识课主讲教师的意见,提出要策划一套大型的多学科的青年普及读物,同时又是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这项建议得到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的支持,并由他牵头,组成了一个在学术界和教育界都有相当影响力的编审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是有效地联合了许多重点大学,协力同心来做成这套大型的书系。北京大学出版社历来以出版高质量的大学教科书闻名,由北大出版社承担这样一套多学科的大型书系的出版任务,也顺理成章。

编写出版这套书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充分整合和利用全国各相关学科的教学资源,通过本书系的编写、出版和推广,将素质教育的理念贯彻到通识课知识体系和教学方式中,使这一类课程的学科搭配结构更合理,更正规,更具有系统性和开放性,从而也更方便全国各大学设计和安排这一类课程。

2001年底,本书系的第一批课题确定。选题的确定,主要是考虑大学生素质教育和知识结构的需要,也参考了一些重点大学的相关课程安排。课题的酝酿和作者的聘请反复征求过各学科专家以及教育部各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意见,并直接得到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支持。第一批选题的作者当中,有一部分就是由各大学推荐的,他们已经在所属学校成功地开设过相关的通识课程。令人感动的是,虽然受聘的作者大都是各学科领域的顶尖学者,不少还是学科带头人,科研与教学工作本来就很忙,但多数作者还是非常乐于接受聘请,宁可先放下其他工作,也要挤时间保证这套书的完成。学者们如此关心和积极参与素质教育之大业,应当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本书系的内容设计充分照顾到社会上一般青年读者的阅读选择,适合

自学;同时又能满足大学通识课教学的需要。每一种书都有一定的知识系统,有相对独立的学科范围和专业性,但又不同于专业教科书,不是专业课的压缩或简化。重要的是能适合本专业之外的一般大学生和读者,深入浅出地传授相关学科的知识,扩展学术的胸襟和眼光,进而增进学生的人格素养。本书系每一种选题都在努力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把学问真正做活了,并能加以普及,因此对这套书作者的要求很高。我们所邀请的大都是那些真正有学术建树,有良好的教学经验,又能将学问深入浅出地传达出来的重量级学者,是请“大家”来讲“通识”,所以命名为《名家通识讲座书系》。其意图就是精选名校名牌课程,实现大学教学资源共享,让更多的学子能够通过这套书,亲炙名家名师课堂。

本书系由不同的作者撰写,这些作者有不同的治学风格,但又都有共同的追求,既注意知识的相对稳定性,重点突出,通俗易懂,又能适当接触学科前沿,引发跨学科的学习和思考的兴趣。

本书系大都采用学术讲座的风格,有意保留讲课的口气和生动的文风,有“讲”的现场感,比较亲切、有趣。

本书系的拟想读者主要是青年,适合社会上一般读者作为提高文化素养的普及性读物;如果用作大学通识课教材,教员上课时可以参考其框架和基本内容,再加补充发挥;或者预先指定学生阅读某些章节,上课时组织学生讨论;也可以把本书系作为参考教材。

本书系每一本都是“十五讲”,主要是要求在较少的篇幅内讲清楚某一学科领域的通识,而选为教材,十五讲又正好讲一个学期,符合一般通识课的课时要求。同时这也有意形成一种系列出版物的鲜明特色,一个图书品牌。

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既能满足社会上读者的需要,又能够有效地促进全国各大学的素质教育和通识课的建设,从而联合更多学界同仁,一起来努力营造一项宏大的文化教育工程。

目 录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总序

本书系编审委员会/1

第一讲 什么是诗学/1

- 一 诗学在西方的起源和变迁/4
- 二 中国古代对诗学的理解/6
- 三 学习诗学和文艺欣赏的关系/12

第二讲 体物与尽己/17

- 一 体验论在中国古代诗学中的地位/18
- 二 体道和体物/24
- 三 尽己/28

第三讲 神思/40

- 一 文学家的思/41
- 二 神思的基本涵义/45
- 三 神思的几个特点/49

第四讲 顿悟与渐悟/56

- 一 悟在诗学中的提出/57
- 二 悟的达成的两种方式/59
- 三 顿悟与渐悟的互相依存/63

第五讲 发愤抒情与悲音为美/69

- 一 发愤著书说的形成及其根据/70
- 二 悲音为美/78

第六讲 虚静与静穆/85

- 一 创作主体的虚壹而静/86

二 文本的静穆境界/91

三 文艺欣赏给接受者“疏秽镇浮”/97

第七讲 物色移情/101

一 情由景生,辞以情发/102

二 比德于物,物移我情/108

三 我情注物,照之则美/113

第八讲 意境/121

一 象之意和境之味/124

二 情之境和意之象/131

三 创作思维中的意与境/137

第九讲 辞达与意在言外/142

一 文学家怎样才算做到了辞达/143

二 言意之辩与言外之意/149

第十讲 兴、观、群、怨/157

一 历来对兴、观、群、怨的不同阐释/158

二 兴、观、群、怨作为诗学概念的内涵/161

第十一讲 赋、比、兴/174

一 作为诗歌写作手法的赋与作为文体的赋/177

二 比的特色及其分类/187

三 兴的产生及其特色/193

第十二讲 才性与风骨/203

一 才性的含义及其理论基础/204

二 文气说与才性论/208

三 才性与风格类型/214

四 风骨与阳刚之气/221

五 阳刚阴柔与中和之美/224

第十三讲 本色当行/231

一 以文为诗和以诗为词的是非功过/232

二 对叙事文学风格的认识/243

三	戏曲文学的本色与藻丽之争/251
四	小说和戏剧的结构技巧/256
第十四讲	写儿女之真情/260
一	对民歌的阐释与“儿女真情”说/261
二	小说戏剧创作与“儿女真情”说/264
三	对于淫秽小说的辩护和批判/272
第十五讲	知言、知人、知音/280
一	同嗜与异趣/282
二	孟子的“以意逆志”论和“知人论世”论/287
三	刘勰的“知音”论和“六观”论/293
参考书目	/298
后 记	/300

第一讲

什么是诗学

诗学在西方的起源和变迁

中国古代对诗学的理解

学习诗学和文艺欣赏的关系

本书要和读者谈论中国古代诗学，首先就有必要交代什么是诗学。对于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人，诗学，不是一个陌生的术语。从 20 世纪初期开始，近一百年来，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在我国的美学、哲学的论著里面，在文学理论、评论论著里面，以至在报刊文章里面，它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使用得越来越广泛。不过，各种论著中赋予诗学这个词语的含义，却往往有很大的差别。“诗学”一词的多义、歧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诗”这个词的多义、歧义。说到诗，最常见的是指一种文学体裁，与散文、小说、戏剧文学不同的文学体裁。在这个范围里，诗学，就是讨论诗歌文体的写作和欣赏的种种问题的一门学问。这一层意思浅显明白。但是，一般所说的诗学，我们在这本书里要讨论的诗学，不限于这层意思，而比它要广泛、深入。其次，有时，人们用“诗”这个词指代整个文学，甚至指代所有的文学艺术，指代理想的文学、艺术所应该具有的品质。古希腊著名诗人西摩尼德斯说：“画是一

种无声的诗，而诗则是一种有声的画。”我国古代优秀的诗人和书法家苏轼说：“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显然，“画中之诗”的“诗”不再指文学体裁，而是指一切优美的文学艺术作品所具有的素质。我国当代作家张承志，把他的三篇小说《海骚》、《黑山羊谣》和《错开的花》叫做“三首长诗”。这三篇作品都是散文体的，中间甚至有些论文体的段落，作家却说它们是诗。他说，在小说文体上的新探索，给予了他无拘无束地发掘和丰富汉语这美好文字的喜悦。有些评论家也把这几部作品叫做诗意小说。诗意小说的“诗”，不再是狭义的诗歌，而是说，这些小说具有非同寻常的品格，有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特别追求。从这一类对诗的理解出发，诗学，就是关于文学以至各种艺术的理论，就是关于在不断地发展、变动中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的理论了。再次，在更高、更深的层面上，诗，是指主体所获得的美妙深邃的人生体验。我们看到湖水在月光下银波微荡，燕子在轻风里回翔，或者看到活泼的幼儿在草地上围着老人嬉笑，常常会脱口赞叹：多么富有诗意呀！南宋文学家张孝祥的《庾楼和林黄中韵》前半部分写道：

九月扁舟下水风，一尊佳处与君同。

眼高四海氛尘外，诗在千山紫翠中。

当主体脱离尘世的纷扰，忘情于“千山紫翠”之中，他的心弦上奏响的就是诗。即使置身闹市，即使在日常起居饮食时，沉思也能使我们走进诗境。所谓“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心远”，就是有一颗诗心，以诗的态度对待生活。用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说，“人类此在在其根基上就是‘诗意的’”；“诗乃是对存在和万物之本质的创建性命名”。^①这个意义上的诗学，其实已经是哲学。海德格尔的哲学，就是一种诗学的哲学。诗的高境界、文学艺术的高境界和哲学的高境界是彼此重叠、彼此融合的，人生的高境界是诗与哲学的结合。南宋理学家和诗人朱熹有《偶题》诗道：

步随流水觅溪源，行到源头却惘然。

始悟真源寻不到，倚筇随处弄潺湲。

这首诗把哲学的诗意和文学的诗意融合在一起，人生的奥义在于某种终极

性的追求,在于这种追求的过程性,把眼前一切活动与终极目标链接,倚着手杖、面对无尽地流淌的溪水沉思,面对不断变幻的世相沉思,这正是“此在”的诗意。

相应于诗的上述几种含义,诗学也具有不同的几层内涵。一是指对诗歌的写作技巧的研究,二是指文学理论或文学艺术理论,三是指人类对精神家园的寻求,是诗意的、诗化的哲学。本书的讨论以诗学的第二种含义为主,也兼及第一和第三两种含义。在第二种含义中,以文学理论为主,也兼及绘画、书法和音乐理论中与文学理论关系比较密切的内容。

在人们的印象里,“诗学”这个词语和它所传达的概念,好像是从西方引进来的。我这本书要谈的却是中国古代诗学。中国古代有没有“诗学”这个词儿,有没有这个术语,有没有“诗学”这样一个治学的领域呢?当然是有的。法国文学理论家托多洛夫在和人合著的《语言科学百科辞典》的“诗学”条里说:“在西方,人们习惯于把古代希腊作为诗学的发端,实际上与此同时,甚或更早,这种对文学的思索已经在中国和印度开始。”中国古代诗学有自己独立的系统,有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有丰富精彩的内容。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承认,进入近代之后,尤其是在五四之后,中国人讲诗学,在这个概念的内涵上,在诗学理论的框架上,是参照了西方。诗学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成为一个学科,和其他许多人文学科一样,也是在西方的影响下才发生的,是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发生的。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的绪论中讲:“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金岳霖先生当时评论说,冯友兰是“把中国的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2〕}诗学史和哲学史情况类似而且关系密切,我们讲中国古代诗学,是站在今天看过去;而今天我们的观念主要是近百年来形成的,是受到了西方观念影响的;今天的学习和研究,又是在与世界对话的开放环境下进行的。所以,在本书的开头,有必要先简略谈谈中国的诗学与西方的诗学的同与异,谈谈广义的诗学和狭义的诗学各自的范围,也谈谈学习、了解诗学有什么现实的意义。而在后面的各讲中,也将从现实的创作和欣赏的实际出发,到古

代诗学中寻珍探宝,结合西方诗学来阐发中国古代诗学的现实意义。我们既要从西方之所谓诗学的眼光去“发现”中国古代先贤对诗歌、对文艺的论述的意义,也要从中国历来论诗、论画、论乐的智慧来补救西方诗学的偏颇和不足。好的诗歌,好的艺术,好的诗学,都是属于全人类的。

诗学一般是理论形态,以理论著述的形式存在着,但诗学还存在于杰出诗人、杰出的文学艺术家的作品之中。我们领会理论形态诗学里的种种观念意旨,更要紧密结合诗歌和其他各种艺术文本。因此,本书会联系具体作品,来谈对古人诗学思想的理解。我设想,多数读者的更大的兴趣,是凭借对古代诗学的了解,加深对古代诗歌、对古代文学艺术的理解,增添阅读的兴趣,这也是本书期望达到的目的。

一 诗学在西方的起源和变迁

法国让·贝西埃等人主编的《诗学史》中说,“在诗学领域,人们几乎自发地引用希腊起源说”^{〔3〕}。在两千三百多年前的希腊,就有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是流传至今的最早以“诗学”命名的著作,是一部有很高权威性的经典,它对于欧洲乃至世界许多国家的诗学,有极大的影响。但是,亚里士多德其实并不是西方诗学第一人,“诗学”也不一定由他所命名。他的这本书题名原来叫做“亚里士多德的诗学”^{〔4〕},以别于其他人的诗学,在他之前、之后,古希腊有不少学者对诗学发表过意见,有所论述。《诗学史》认为,在明确的、系统的诗学产生之前,有一个潜在诗学的漫长历史。人们关于“诗”的意识、观念,正是在这样的漫长时间里,逐渐积累、逐渐明朗化。人类生活中出现了诗,出现了文学艺术,就有了对诗、对文艺的态度、看法,也就有了最早的、广泛意义上的“诗学”。最早的诗,和音乐、和舞蹈、和祭祀、和劳动、和游戏结合在一起,很难分割剥离。原始的“诗学”,不是单纯关于诗的谈论,而是与人的多种活动领域相关。

诗学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诗的创作的发展和繁荣。荷马史诗流传的时间长、范围广,在古希腊,讨论诗歌往往要以荷马的两大史诗为对象。作为古希腊人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所谓诗,包括史诗、戏剧和抒情诗。古希

希腊人常把诗歌、戏剧创作当做一门技艺。亚里士多德《诗学》开宗明义说：“关于诗艺本身和诗的类型，每种类型的潜力，应如何组织情节才能写出优秀的诗作，诗的组成部分的数量和性质，这些，以及属于同一范畴的其他问题，都是我们要在此探讨的。”但是，他又不是只讲诗歌、戏剧写作的技巧，而是涉及更深更广的方面，古希腊诗学一开始就有了很强的理论性。仔细阅读亚里士多德《诗学》，我们可以了解到：第一，亚里士多德讨论的不是一部两部作品，而是讨论许多的作品，讨论各种各样的诗；第二，他说的诗，不限于狭义的诗歌，而是包括了史诗、悲剧、喜剧以及即兴的故事演唱（“狄苏朗勃斯”）；第三，亚里士多德不是就作品谈作品，他提出和分析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他一开始就“先从本质的问题谈起”，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摹仿；各种艺术的区分在于：采用不同的媒介，选取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方式。他的《诗学》是一部有系统性的理论著作。后来，古罗马的贺拉斯的《诗艺》更多地讨论的是戏剧文学，也讨论了韵律，他要求每一个诗人都以荷马、以古希腊诗人为典范。大致说来，西方古代的诗学，更多地以叙事文学和戏剧为论述对象，它的核心概念是“摹仿”，它所重视的社会作用是“净化”。我们将要讨论的中国古代的诗学，尤其是在进入元明两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的诗学，是以抒情文学为主要对象，它的首要命题是“诗言志”，它所重视的社会作用是“兴、观、群、怨”。两者是很不一样的。

在中世纪，欧洲曾流行过把诗学限定在修辞学范围内的做法，认为“诗学就是根据格律规则创作诗歌的科学”，它的任务是讨论词语搭配、节奏、韵脚。这样做，把诗学的内容狭隘化了，但也有其实用功效。到了20世纪，西方的诗学发生更大的变化，一些学者的注意力从内容转移到形式。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在新的观念支配下，重新论定诗学的性质。托马舍夫斯基说：“诗学的任务（换言之即语文学或文学理论的任务）是研究文学作品的结构方式。”^{〔5〕}日尔蒙斯基说：“诗的材料不是形象，也不是激情，而是词。诗便是用词的艺术，诗歌史便是语文史。”他把诗学分为理论诗学和历史诗学：“解释这些诗歌程序的艺术意义，解释它们相互间的联系和本质的审美功能，是理论诗学的任务。至于历史诗学，它应当澄清各种诗歌程序在诗歌的时代

风格上的起源,阐明它们与诗歌发展史的不同时期的关系。”^[6]形式主义的诗学,开了一种理论风气,其后的结构主义等种种理论学派,演化出若干新的框架,提出一些新的命题。它们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新的研究方法,尤其在对文本本身的细密解剖上,给读者新颖之感。它们的总体倾向,比之于文艺复兴时代、启蒙时代和19世纪的诗学,好像是提出了很新鲜的想法、很“叛逆”的见解。但是,在欧洲中世纪,在中国古代,把诗当做用词的艺术,把诗学看做语文学,却是早已有之并且代不乏人。这类极端化的主张,不可能长久地付之实践,热闹一阵,就被新的思潮取代了。

被多数人接受的是更为通达的看法,如法国的瓦勒里在《诗的艺术》中所说:“根据词源,诗学是指一切有关既以语言作为实体又以它作为手段的著作或创作,而不是以狭义的关于诗歌的美学原则和规则。”或者如瑞士的埃米尔·施塔格尔在《诗学的基本概念》中所说:“‘poetik’一词源自于希腊文,乃 poiëtiketëchne(作诗的技艺)一语的简化。”“‘诗学’……致力于证实人的本质力量如何出现在诗人创作的领域里。”^[7]总之,诗学的概念不是凝固不变,而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演化。我们对于诗学的理解,对于诗学中的许多概念的理解,也不能是单一的,要注意到它们在不同语境里的不同内涵。西方古代和现代诗学都有可以供我们吸收借鉴的精彩的思想、科学的方法,我们在追溯本土诗学传统时,可以用来作比较和参照。

二 中国古代对诗学的理解

中国的诗歌起源很早,对诗歌的正规学习,至少在战国时代就纳入了教育的规定内容。成人和孩子,官员和百姓,都要学诗。至于“诗学”这个名词的产生则要晚得多。从“学诗”到“诗学”,经过了长久的积累;在中国,潜在的诗学比体系严密、观念明确的诗学,历史要漫长得多。前些年曾经有文章介绍说:在中国较早使用“诗学”这一名称的是元代范德机的《诗学禁脔》。这个说法不很确切,从文献学上讲,《诗学禁脔》产生的时代和它的著作权都是有争议的。而比这本书早几百年,在唐代元和三年,也就是公元9世纪初

年,有位叫做李行脩的进士,给唐宪宗李纯上了《请置诗学博士书》^{〔8〕}。这是一封长篇奏议,也可以看做是一篇理论文章。作者十分郑重地建议朝廷专门设立诗学博士,也就是要加强对诗的专门研究。博士是一种官职名称,是学官。唐代原有律学、算学、书学等方面的博士,都是些应用性的学科,而李行脩建议增加诗学这一门,有点儿如今之所谓“弘扬人文学科”的意思。其中所说的“诗”,既是指“五经”之一的《诗经》,又不仅仅限于《诗经》。比如,他说屈原“颇得诗人之风”,说扬雄和司马相如“文虽有余,不足称也”。所以,他希望建立的“诗学”,不限于《诗经》学,而是指有关古代诗歌的学问。他说,汉武帝早就把《诗经》之学立于学官,但是只重视章句而忽视了比兴。李行脩的批评切中要害,汉代研究《诗经》的学者很多,那时的诗学等同于《诗经》学,有齐、鲁、韩、毛四大派,专攻于此的学者难计其数,但大都是做文字的训释,不注意诗歌艺术性的剖析和诗歌意味的领会;对《诗经》各篇意旨、意味的解释,又大都从教化观出发,多牵强附会之说。李行脩这篇奏议还提到唐代有刘迅其人,“说诗三千言,言诗者尚之”。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三加以考证,说刘迅“取《房中歌》至《后庭斗百草》、《临春乐》、《小年子》之类,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拟《雅》章;又取《巴俞歌》、《白头吟》、《折杨柳》至《谈容娘》以比《国风》之流”。可见,唐代的“诗学”的研究对象,不只是文人诗歌,还广泛涉及民间歌谣。李行脩的意见没有被皇帝采纳。据《资治通鉴·唐纪》记载,二十多年之后,唐文宗李昂也曾有意设立诗学一科,但用意与李行脩不一样,大约是要以诗取士:“上好诗,尝欲置诗学士。李珣曰:今之诗人浮薄,无益于理,乃止。”这位大臣认为,以诗取士不可能发现有用的人才。其实,那是唐代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人活跃的年代,只是这些文学家不受当朝权贵的欢迎,更不会受到重用罢了。虽然各个朝代、每个皇帝对于诗歌、文学、艺术的喜好程度不同,唐代以及唐以前的魏晋南北朝,学者们对于诗的研究、对文学艺术的研究,还是一步步细致、深入。从战国时代直到晚清,中国存在着绵延久远的诗学传统。

在中国古代,对诗学有深浅广狭的不同理解,归纳起来,主要有关于《诗经》之学、关于如何做诗之学和关于诗歌之学三种不同的含义。被司空图高度评价、又被《四库全书提要》称为“晚唐巨擘”的诗人郑谷,在《中年》一诗中

有“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之句，明显地把诗学说成是作诗的技巧。明代周晖《金陵琐事》有“诗学”一条，记述：“嘉靖中，司寇顾公华玉，以浙辖在告，倡诗学于清溪之上。门下士，若陈羽伯凤、谢应武少南、许仲夷谷、金子有大车、金子坤大舆、高近思远，相从以游，讲艺论学，绰有古风。”“在告”是官员休假，顾华玉从浙江左布政使任上告假休息期间，与文人们切磋诗艺，这也算是诗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不赞成把诗学仅限于作诗法，他在《日知录》中说，“唐人以诗取士，始有命题分韵之法，而诗学衰矣。”诗歌写作技术化了，诗学就衰亡了。元代刘祁《归潜志》介绍当时文士王郁的观点：“其论诗，以为世人皆知作诗，而未尝知有学诗者，故其诗皆不足观。诗学当自三百篇始，其次《离骚》、汉魏六朝、唐人，近皆置之不论，盖以尖慢浮杂，无复古体。故先王之诗，必求尽古人之所长，削去后人之所短，其论诗之详皆成书。”这是说，诗学要建立在从《诗经》到唐诗的经典作品的研究基础之上。清代翁方纲《石洲诗话》意见与此相近，他曾谈到，他见到的杜甫诗的古今注本有三十多种，注家多有对事实的考证，“于诗理则概未有之闻”，“惟是诗理，古今无二，既知诗，岂有不知杜者？”诗理是一般的原理，适合于所有诗歌的。懂得诗理，就懂得杜甫，懂得各种诗人的作品。“海盐张氏刻有《带经堂诗话》一编，于渔阳论次古今诗，具得其概，学者皆颇问诗学于此书。”那么，诗学就是关于诗歌原理的学问了。梁章钜《退庵随笔》说：诗话自欧阳修《六一诗话》以来，著述很多，其中“教人作诗之言，则不可多得。国朝吴景旭撰《历代诗话》至八十卷，嗜奇爱博，而尚非度人金针。余尝欲就宋人各种中，精择其可为诗学阶梯者，益以明人及我朝名流所著，都为一编，庶几为有益之书。未知此愿何日酬耳”。看来，许多学者对诗学还是有较高的要求，但在西方诗学引进以前，缺乏统一的确切定义。

最早的诗歌教育开始在三千年前，《尚书》的《尧典》中说：“夔，命汝典乐（掌管主持关于“乐”的事务），教胄子（贵族子弟），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朱自清说，这是中国诗论“开山的纲领”，也可以说是中国诗学最早的宣言。它不但显示了那时诗乐合一的状态，而且鲜明地表达了把和谐原则放在中心地位的主张。它要求文学艺术：耿直但要温和，宽厚但要严明，刚